

· 综论 ·

# 基于人的脆弱性的社会保障元理论研究

严新明

**[摘要]**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来,理论研究在推动制度确立、促进政策调整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生理、经济、社会方面研究了人的生命周期中的脆弱性累积效应,借助“水母型”社会结构,静态地展现社会中低龄、青年、中年、老龄的群体分布,以及低龄、老龄群体的弱势状态;动态地跟踪人的“弱-强-弱”变化轨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家庭、互助、市场等保障机制都难以胜任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保障功能,这就需要建立全新的社会保障机制。论文在建构基于牛顿-莱布尼茨公式的社会保障微积分模型的基础上,对社会保障的元理论进行探讨,进而得出:对青年、中年要强化基于就业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当前大量且复杂的平台就业者的社会保障;确保“老弱”因缴税/费或公民社会权的社会保障;为了未来公民的健康成长要确保“幼弱”的社会保障(福利)。由于社会保障是生命周期过程中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方式,政府必须科学理性地设计政策,以确保个人和家庭对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

**[关键词]** 生命周期;人的脆弱性;“水母型”社会结构;社会保障微积分模型;平台就业

## 一、引言

人类社会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社会保障制度的。作为一种安全保障机制,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就像中国古代救灾济贫,西方早期的宗教慈善事业,以及现代典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等,均表明人类需要安全保障是由自然人自身能力的局限及社会各种风险制约的结果。<sup>①</sup>

一般认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随着生产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化尤其是机器大工业生产使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遭受的风险事故增多、失业增加。市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要手段配置资源的经济,其有利于实现效率,却不利于社会公平。正是在这样的经济社会形势下,国家开始通过立法的形式来介入济贫事务,1601年英国颁布《伊丽莎白济贫法》,该法规定:政府有责任对没有工作能力的贫困者提供帮助,保障穷人的最低生活水平;政府有义务帮助贫穷的孩子去做学徒,并给身体健全者提供工作。<sup>②</sup>

**[作者简介]** 严新明,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基地暨南京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南京大学童星教授、赵曙明教授对此文有贡献,在此致谢!文责自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水母型社会结构的‘弱有所扶’制度建设研究”(18BSH045)。

① 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8页。

② 丁建定、杨凤娟:《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第5页。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调整,除了要有上述的经济社会条件,还需要一定的理论基础,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如德国新历史学派的理论推动19世纪80年代德国率先出台三部社会保险法;英国“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逐步确立了福利国家的理念,“贝弗里奇报告”则是行动纲领和计划蓝图,其中既有一般的基本原则和框架结构,又有具体的实施方案。<sup>①</sup>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全面陷入“滞胀”,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凯恩斯主义失灵,福利国家制度面临危机。在这种背景下,1979年赢得大选、担任首相的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开始了英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史称“撒切尔革命”。其实,早在“撒切尔革命”发生之前,在后来作为撒切尔政府思想库的“经济问题研究所”一批学者坚持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其中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1974年)、弗里德曼(1976年)的理论为主,他们肯定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对福利制度多有批评,从而影响并推动了福利国家的改革。当代“第三条道路”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吉登斯,他提出了“无责任即无权利”“积极福利”“社会投资国家”等一系列全新的思想。英、美、德、法等国信奉“第三条道路”理论并实施相应的政策。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来,争论一直未曾中断。马雷克·戈拉在一篇评论中写道:养老金领域面临的问题是,起初(例如一百多年前社会保障的关键概念诞生时)旨在帮助年迈工人的一种设计,演变成了一种在生命周期中进行收入配置的不合理制度。<sup>②</sup>郑功成指出:社会保障主要是应对工业化劳动中的风险而设立的应对政策,当前,工作性质改变和就业形态多样化是大势所趋。<sup>③</sup>全球化对社会保障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在劳动力市场发生的重大变化,包括“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和服务部门的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问题,如:就业的灵活性越来越强,某些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低工资就业者人数增加,<sup>④</sup>对社会保障提出了挑战。

因此,我们需要在当前的全球化、网络化形势下看待就业和社会保障,本文基于人的生命周期中的生理、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脆弱性,探讨就业形式变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立足牛顿-莱布尼茨公式,建构社会保障微积分模型,分析社会保障基本原理,并提出政策建议。

## 二、基于生命周期的人的脆弱性及其社会累积效应

### (一) 人的生命周期

从出生时“呱呱啼哭”的婴儿开始,历经低龄阶段(包括儿童与少年期)、青年阶段、中年阶段,最后步入老龄阶段,这就是一个人完整的生命周期(见图1)。当然,这不排除少数人少儿夭折、英年早逝,未能活到老龄阶段。在人的生命周期中,从生理方面看,人的体力、精力、能力之强弱在各个阶段并非一成不变;从经济社会方面看,身处各个阶段的人之经济收

① 童星:《社会转型与社会保障》,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第119-126页。

② 罗伯特·霍尔茨曼等主编,郑秉文等译:《养老金世界变化中的名义账户制(上卷):进展、教训与实施》,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7年,第117页。

③ 郑功成:《中国医疗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病有所医及其发展路径》,《东岳论丛》2010年第10期。

④ 罗兰德·斯哥等编,华迎放等译:《地球村的社会保障——全球化和社会保障面临的挑战》,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第1页。

人多少、社会地位高低更不可能始终如一。



图1 人的生命周期

### (二) 人的匮乏与富足周期

1902年，英国学者朗特里在讨论人的生命周期各阶段经济收入变化时，首创了“匮乏与富足周期”的概念（见图2），指出一个劳动者的一生由5个相互交替的匮乏与相对富足的时期构成。这包括：童年时期，如果父亲不是熟练工，他就有可能生活在贫困中；当他自己开始挣钱，并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生活会好起来，也能余点钱，这一相对富足时期可以延续到他结婚后；等他有了小孩特别是两三个小孩后，又会生活在贫困中；等到他的大孩子长到14岁，开始挣工资了，生活又会富裕起来；等孩子都已结婚并且离开了他，他因年事已高，无法继续工作，以前的收入也很难让他有多少节余，终至坠入贫困。<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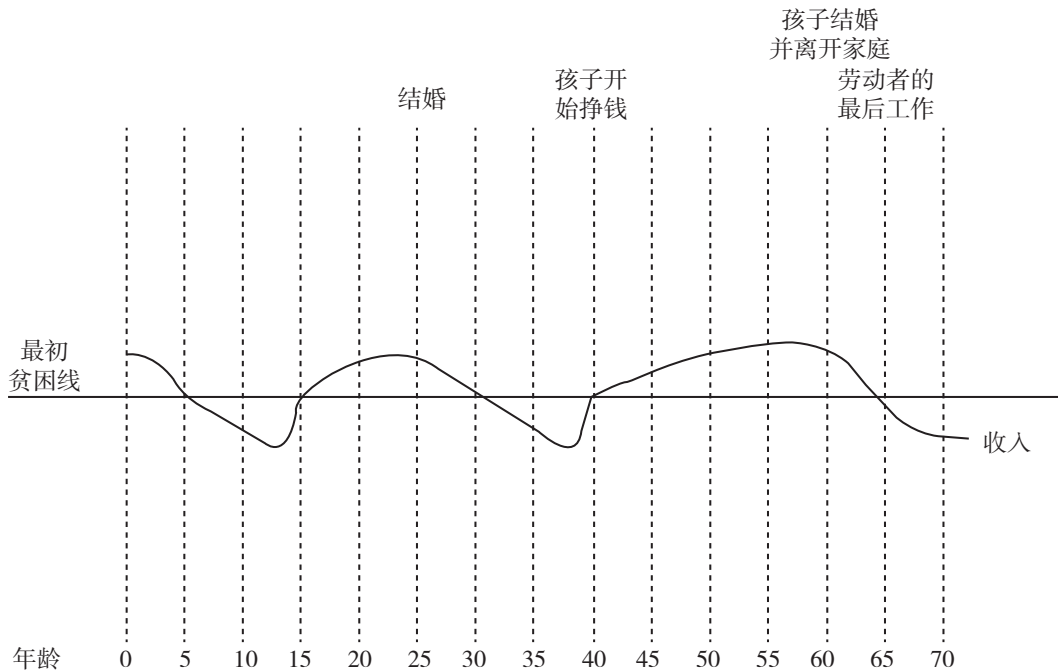


图2 朗特里的“匮乏与富足周期”

资料来源：霍华德·格伦内斯特著，苗正民译：《英国社会政策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9页。

### (三) 生命周期储蓄者假说

在经济学中则有“生命周期储蓄者假说”，认为个人或家庭的储蓄行为就是为了熨平生命全程中收入的波动，使其不致影响到消费的稳定。<sup>②</sup> 经济学家解释说，个人在一生中会对他们的收入流量的分配作出合理选择：在生命的早期，人们借钱买房或借钱供孩子接受教育；在中

<sup>①</sup> 霍华德·格伦内斯特著，苗正民译：《英国社会政策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8页。

<sup>②</sup>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萧琛等译：《经济学（第16版）》，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340页。

年时期，他们通过储蓄、购买养老保险、理财或认购股份来积聚财富；到了老年，这些财富就会被消耗掉。如图3所示，通过仔细计算和预先考虑的方式，个人在生命周期中对自身的收入进行再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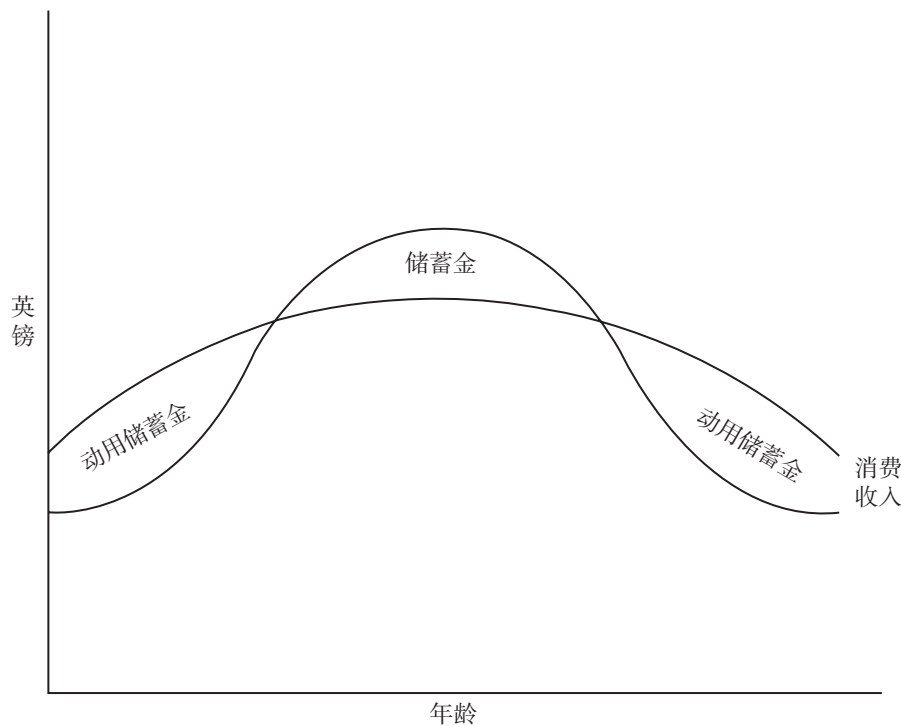


图3 生命周期储蓄者假说中的收入与消费情形

资料来源：霍华德·格伦内斯特著，苗正民译：《英国社会政策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1页。

当然，在劳动者有收入阶段，其是否存款？存多存少？这些都是个体的选择和决策。但个体理性不一定带来社会理性。由于“幼弱”和“老弱”是人的生命周期中必然内含的阶段和状态，就容易出现个人和家庭的生活贫困问题，如有孩子特别是多个孩子的家庭生活困难，老年人陷入失能失助的贫困状态等等社会问题。每个人生命周期中内含的“幼弱”和“老弱”状态，加上人在劳动年龄阶段也可能存在因生病或失业等导致无收入、低收入，或虽有收入且不低却因未能妥善理财、开支管理不善而带来生活困难等情况，它们累积起来的社会效应又如何呢？

#### （四）“水母型”社会结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尝试建构“水母型”社会结构（因形似水母而得名，如图4）。该结构静态地展现社会中低龄、青年、中年、老龄的群体分布，以及低龄、老龄群体的弱势状态；动态地跟踪平常人从低龄到青年、中年所表现出的由弱变强，从中年到老龄又表现出由强变弱的轨迹；并呈现出某些人群在青年、中年阶段也会由各种原因暂时陷入弱势甚至是终生处于弱势状态。基于“水母型”社会结构来反观个人的生命周期，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的成长和变化，特别是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弱势群体的生理、学习、就业、收入、生活等“脆弱性”状态。关于“水母型”社会结构，说明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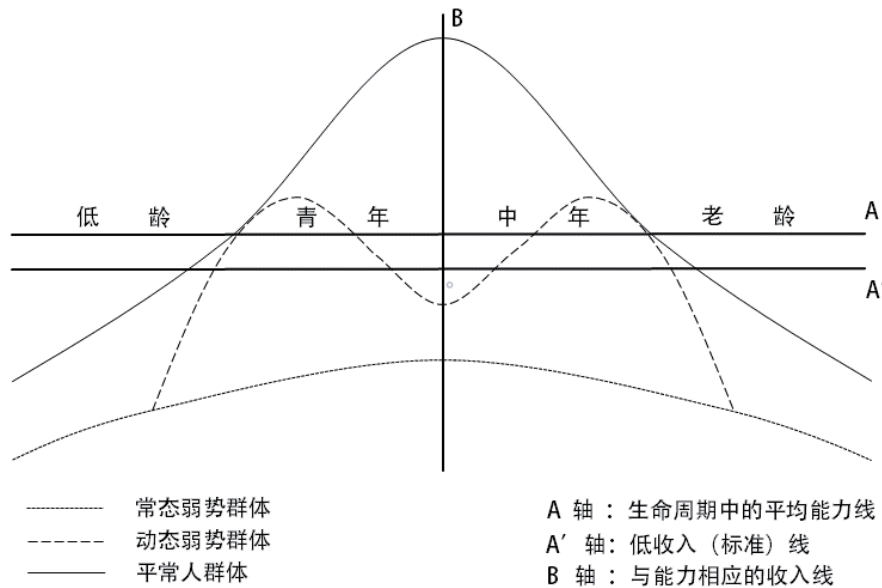


图4 “水母型”社会结构

1. 三大群体概念：

平常人群体(图中实线,此处不用“正常人群体”,是为避免与其对应的“不正常人群体”),就是依靠自身能力,通过劳动和就业获得收入能够满足自己及家庭成员需求的人群,包括占比很大的普通人和占比较小的强势群体。平常人群体中的低龄因“幼小”、老龄因“体衰”也有“弱”的方面(低龄和老龄时在A轴以下),对其扶助的责任以家庭为主、国家和社会分担。

动态弱势群体(图中段状线),是指因健康、性别、教育、技能、就业机会、地区差异等原因,有劳动能力但就业情况不好、收入不稳的人群,他们在基本生活、医疗、住房、教育培训等方面可能需要国家和社会扶助。

常态弱势群体(图中点状线),包括“鳏、寡、孤、独、残”等弱者,即孤儿、残疾人、孤寡老人等,他们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无法定赡(抚)养人,是在基本生活、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多方面都需要国家和社会扶助的人群。

2. 三条轴线含义：

A轴：生命周期中的平均能力线,线的上部表示能力强、下部表示能力弱。第一,平常人群中低龄者、老龄者能力是弱的;青/中年人能力是强的。第二,动态弱势群体随着年龄变化,低龄者、老龄者能力是弱的;青/中年人因教育、地区差异、技术升级等原因,其能力在强弱之间变化,表现出动态特点。第三,常态弱势群体中的人,能力都是弱的。

A'轴：低收入(标准)线,按照目前比较多国家通行方法,即把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相对贫困线,也就是低收入(标准)线。

B轴：与能力相应的收入线,该线表示人们以其能力劳动和就业所获得的收入。向上部分表示能力强、收入高;向下部分表示能力弱、收入低。

3. 人的生命周期中三种“弱”的征象

一是幼弱——人之初其本弱。每个人的成长都要经过幼小阶段,不能自立,必须依靠母乳喂养一阶段之后才能逐步摄入固态食物,并学会站立、行走,学会语言、动作等等。此后,在

身体成长的过程中,还要经过幼儿园、小学、中学及大学教育、技能培训,帮助儿童在心智等方面成长为青少年,进而成长为成年人、劳动者,逐步实现人生由“弱”变“强”的过程。

二是老弱——人之老其亦弱。人们由活力四射的青年步入身心沉稳的中年,随后便会进入老年阶段,一般将这个转折点定为60岁或65岁。进入老龄阶段的人会在多方面表现出“弱”的特点:首先是体力弱,人的体质在达到高峰之后,自然会衰退;其次是精力弱,表现在听力、视力、嗅觉等多方面;再次是记忆弱,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下降是必然的,包括智力都会下降;最后是反应迟缓、动作慢。也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老人的工作能力、生活能力甚至自理能力都会下降甚至丧失。

三是青/中年人中的常态弱和动态弱。常态弱势群体中的青/中年人在其生命周期中,主要是由于生理、身体、心智等原因,在学习、就业方面困难重重,收入不高甚至完全没有,从而在生活诸多方面受到影响。动态弱势群体虽然有劳动能力但受经济社会、地理因素等影响,就业情况不好,收入不稳定,生活诸多方面也受到影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全社会肯定存在“幼弱”“老弱”的群体和“动态弱”“常态弱”的群体。由于具有“幼弱”“老弱”以及“常态弱”“动态弱”等特征的人(群)都可能出现生活苦、生存难的问题,而每个人都存在“幼弱”“老弱”和青/中年阶段可能的“动态弱”问题(极少数人可能终身都是“常态弱”),因此,“青年与老年时期的痛苦与欢乐,以及伴随而来的经济状况的波动,一直是个人所关心的事情,同时也可能是慈善机构和地方政府机构所关心的事情”。<sup>①</sup>有劳动能力的人为还不能劳动的儿童和已经不能劳动的老人、病人、残疾人而劳动,这是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之一;代际之间的抚养和赡养,同代之间的同舟共济,也是任何人群共同体稳定存续发展的前提之一。既然如此,对人的脆弱性实施保障,就成为任何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安排。

### 三、人的脆弱性保障由家庭到社会的过渡

人的脆弱性保障包括:对不能自立的“幼弱”、不能自理的“老弱”、不能自愈的“病弱”、不能自足的“动态弱”“常态弱”等等提供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精神上的慰藉。这些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的提供,经历了一个由家庭向社会的扩散过程。

#### (一) 传统社会的家庭保障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由婚姻而来,生育功能又体现了婚姻的目的。生育的合法性就是要求婚内生育,也就是要求以家庭作为生育子女、繁衍后代的基本单元。生育的后续在“养育”,“养”侧重提供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保证子女生理意义上的健康成长;“育”指家庭作为双系抚育的单元,实际上起着使孩子社会化的重要功能。<sup>②</sup>在父母双亲的精心养育下,子女“幼弱”期往往会成为一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段。

在传统社会中,如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庭还起着赡养处于“老弱”期长辈以及照料“病弱”

<sup>①</sup> 霍华德·格伦内斯特著,苗正民译:《英国社会政策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2页。

<sup>②</sup> 童星:《现代社会学理论新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5页。

期家人的功能。由于家庭作为基本的生产生活单元，人的生老病死都离不开家庭，家庭的保障功能就不仅仅是父母对子女的顺向养育，而且包括子女对父母的逆向赡养，以及家庭对处于患病期家人的照料。

总之，每个人的“幼弱”“老弱”“病弱”的保障一开始都是在家庭中实现的。这种家庭保障，是指由家庭提供的对家庭成员的生活保障，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内容。在家庭保障中，家长或成年成员充当着责任主体，当然每个家庭成员均会有较为明确的分工，从而在实质上仍含有家庭成员之间长期互惠的内生机制，<sup>①</sup>包括代际之间互惠的机制。为了更好地实施家庭保障功能，传统社会的家庭规模通常比较大，甚至在同宗同源的大家族间都存在着这种互惠机制。

### （二）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家庭保障职能的消解

当工业化来临时，原先作为生产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其生产职能逐步被剥离到了工厂企业，只剩下生活职能，这就导致家庭的保障功能失去了物质基础。原先以家庭为单元的男女间的自然分工也受到冲击，家庭女性成员和男性成员一样，越来越多地走出家庭进入工厂企业打工，这又导致家庭的保障功能失去了人力资源基础。工业化还带动了城市化，许多家庭的青壮年成员离开土地，离开家乡，前往城市中的工厂企业谋生，导致外出谋生的子女离开了父母的家，重新组建自己的小家庭，特别是在谋生的地方有定居机会时，尤其如此。家庭的小型化，丧失了大家庭乃至大家族的保障能力。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提升，预期寿命得以增长，父母不与其子女生活在一起的期限延长了，“空巢”家庭的数量呈增加之势。工业化引起家庭结构变化的重要后果之一，是家庭的赡养老年人的功能弱化了。<sup>②</sup>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引起老年人的照顾方式、保障形式变化的最重要原因。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导致老年人的经济保障、家庭照顾以及老年人在家庭中地位的丧失，至少可以列出如下若干事实：其一，工业化导致每个人，不管是子女还是其父辈，都要靠工资收入为生，在某些情况下，子女或其父辈都不能自己左右自己的经济生活。其二，由于城市化的推进，城市的扩大和就业因素、居住条件的限制，使子女对父辈的照料受到了住房、交通，特别是休闲时间等一系列的限制，困难增多了。其三，对老弱病残家庭成员的照料很有必要，但在现代生活节奏下，家庭成员特别是占相当比重的妇女都因就业而不在家，使这些照料难以在家中实现。其四，老年人的地位、老年人的价值，如照料幼儿的职能因为教育的因素、社会观念的因素正在日渐由幼儿园、学校等社会性机构所代替。其五，老年人与子女共同生活的比重因国家不同而异。<sup>③</sup>

### （三）越出家庭的保障机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有家庭之外的保障机制来应对和解决人的生命周期中的各种脆弱性，包括低龄阶段的“幼弱”、老龄阶段的“老弱”、患病期间的“病弱”，以及劳动年龄阶段的各种“动态弱”和“常态弱”，帮助这些脆弱群体得到各种基本生活需求方面的保障。这种家庭之外的保障机制早在工业化开始之前就已存在，工业化开始之后更是得到了蓬勃发展。

#### 1. 社会互助

① 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0-31页。

② 刘燕生：《社会保障的起源、发展和道路选择》，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48页。

③ 刘燕生：《社会保障的起源、发展和道路选择》，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49-51页。

最先出现的是社会互助。社会互助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墨子就主张“兼爱交利”,大思想家孟子亦主张“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sup>①</sup>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互助,也不乏零星的实践。如我国古代乡里“义仓”备荒,救济本乡人;“义田”奖学,资助读书上进的后生,等等。在儒家仁政思想影响下,还出现了官府对这种社会互助的支持甚至在特殊的时空条件下由官府直接操办,如宋代设常平仓、惠民仓、福田院、广惠仓,用于养老、恤孤、济贫;元代设养济院,收养“诸鰥寡孤独、老弱残疾、穷而无告者”;清代举办社仓、义学、施医局等。

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举办学堂,开展慈善事业等。也有政府出面认可并支持教会所承担的社会互助,如上述1601年英国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就规定济贫事业属于教区的义务,规定救济的对象是有劳动能力但没有工作的人、没有劳动能力的贫民和无依无靠的孤儿。此后,各地开始出现由官方直接出面或由官方支持民间机构,努力为失业者提供工作,对贫穷家庭的小孩进行就业训练,对老年人、患病者、孤儿收容照顾等等。

英国是工业革命最早的国家,也是工人阶级互助组织的发祥地。对老、弱、病、残人员的保障,最初在工人之间形成的互助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17世纪,英国就已经出现工人举办的“友谊社”(friendly society)和“工会俱乐部”(union club)等私人自助机构。“友谊社”成员上交一定的互助金性质的会费,在生病时可以得到补助,年老时可以得到年金,死亡时可以得到一笔安葬费等等。到18世纪末,英国“友谊社”约有7200个,但一般规模都很小,每社成员平均97人,成员总数约为70万人。在19世纪后半期,“友谊社”发展更快,80年代末,英国“友谊社”成员总数已达400—450万人,接近成年男子人口的半数。<sup>②</sup>

“友谊社”、工会等工人自助组织只能解决一部分收入较高的工人受困时获得帮助的问题,众多低工资工人由于交不起互助金而无法享受这种互助式保障,而且这种自助组织把妇女完全排斥在外。<sup>③</sup>当然,工人互助组织由于缺乏科学的计算方法和管理知识,又受行业分割的影响,其规模一般不大,互助共济的效能发挥和自身抗拒风险的能力均受到严重限制。根据约翰·巴顿的分析,不能坚持长久、逐渐破产是友谊社的通病。“一个友谊社能维持50年以上的是不平常的事;如能维持50年而又不呈现衰微征兆的则是非常不平常的了……在大多数情况之下衰败是因原计划中的缺点所引起,而不是由于管理不善或者欺诈”。<sup>④</sup>

## 2. 商业保险

超出家庭(家族)范围的保障形式,除了社会互助以外,就是借助市场机制运行的商业保险。商业保险最初出现在海事领域,海洋运输和捕捞业的利润巨大,风险也极高,在摸索出海事风险的概率之后,立足于大数定律基础上、体现互助共济原则的海事商业保险应运而生。其后,商业保险业便向海事领域以外延伸,出现了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等化解劳动者和社会成员各种社会风险的重要商保险种。这些商业保险形式同后来的社会保险最终都是解决劳动者和社会成员的老年、疾病、丧失劳动能力后的收入保障问题,但在历史演变中,由于基

① 孟子:《滕文公上》,转引自陈戌国点校:《四书五经(上)》,岳麓书社,2014年,第86页。

② 刘燕生:《社会保障的起源、发展和道路选择》,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56-57页。

③ 刘燕生:《社会保障的起源、发展和道路选择》,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58页。

④ 刘燕生:《社会保障的起源、发展和道路选择》,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60-61页。

本思路、操作手段与方法不同而演进不同的机制。

在英国，基于友谊社等互助组织实践活动的经验积累以及其后关于概率、生命表等研究的推动，逐步形成了市场机制下运行的人寿保险。第一个以友谊社形式发展起来的人寿保险公司，是1706年建立的永存保险公司。其后不久，当时两家已有的保险公司——皇家交易公司和伦敦保证公司——也开辟了人寿保险业务。<sup>①</sup>由于商业人寿保险借助于市场机制运行，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两个缺陷：一是以缴费为享受保障的前提，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群）可能根本不具备缴费的条件；二是逆向选择问题，即对于被保险对象的健康和养老保险方面的选择性费率，可能会屏蔽掉一些想参保的对象。

商业保险（主要是人寿保险）虽然也是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但它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及其他社会保障子系统或项目相比，却缺乏了经济福利性这一必备要素，加之商业保险的营利性、自愿性以及由市场调节等，显然不适合纳入社会保障体系。<sup>②</sup>由此可见，商业保险不能成为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保障，只能作为部分有收入、能投保的人对收入和医疗等方面的补充性保障。

### 3. 社会保障

既然家庭保障机制、互助保障机制、市场保障机制都难以胜任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保障功能，这就需要建立全新的社会保障机制。

其实，社会保障的理念在中外典籍中都古已有之。在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就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sup>③</sup>可见，孔子将“大同”社会作为最高理想，其本质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在生产上是人人尽自己的努力去劳动，在生活上实行社会统筹，各得其所。“大同”社会的理想既涉及到社会制度，更包含了丰富的社会保障思想，即“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西方，古希腊柏拉图从生产资料公有、人的可能遭遇和保障方面描述道：“任何一个公民有时有好的遭遇，有时有坏的遭遇，这种国家很可能会说，受苦的总是国家自己的一个部分，有福应该同享，有难应该同当”。<sup>④</sup>“我们还曾一致说过，这是一个国家的最大的善，我们还把一个管理得好的国家比之于个人的身体，各部分苦乐同感，息息相关”。<sup>⑤</sup>

## 四、人的“脆弱性”的微积分分析与社会保障应对

基于血缘亲情关系的家庭（家族）保障，天然排斥精算；基于人类共情同情心理和共同宗

① 刘燕生：《社会保障的起源、发展和道路选择》，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74-75页。

② 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4页。

③ 孔子：《礼记·礼运》，转引自陈戌国点校：《四书五经（上）》，岳麓书社，2014年，第513页。

④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00页。

⑤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02页。

教信仰的社会互助，也不需要精算；基于精算的商业人寿保险则仅限于算计保险公司和参保人之间，即保险合同签订双方的利益关系。社会保障作为一种人为设计的社会制度，既然超越了血缘亲情关系，也超越了共情同情心理和共同的宗教信仰，就不仅不排斥、而且必须依赖理性的精算。这种精算的视野和格局又远比囿于签约双方利益博弈关系的商业人寿保险要宽阔得多，必须面向整个社会，解决全体社会成员“幼弱”不能自立、“老弱”不能自理、“病弱”不能自愈、“动态弱”“常态弱”不能自足的问题。这就需要回到前述的“水母型”社会结构上来。

我们将图4“水母型”社会结构中的“平常人群体”实线抽取出来，就可以得到人的生命周期曲线（见图5），并进一步借助微积分理论对人的生命周期中的“弱”进行分析（见图6），从而探究社会保障制度是如何对人的“脆弱性”进行应对的。



图5 人的生命周期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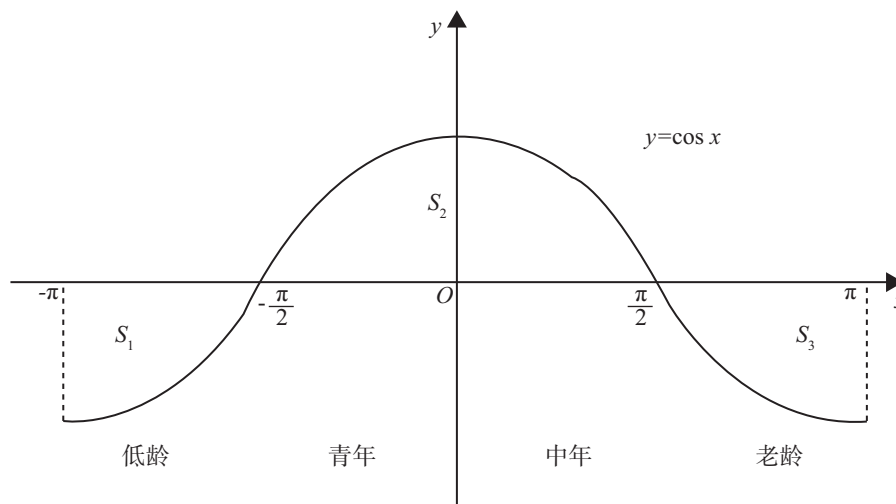


图6 人的生命周期微积分分析

注：S分为 $S_1$ （低龄取-）； $S_2$ （青年和中年取+）； $S_3$ （老齡取-）。

牛顿-莱布尼茨公式告诉我们，<sup>①</sup>如果函数 $F(x)$ 是连续函数 $f(x)$ 在区间 $[a,b]$ 上的一个原函数，那么：

① 同济大学数学系编：《高等数学（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40页。

$$\int_a^b f(x)dx = F(b) - F(a) \quad (1)$$

对应到人的生命周期，我们可以将其转化为：

$$\int_{-\pi}^{\pi} f(x)dx = F(\pi) - F(-\pi) \quad (2)$$

质而言之，人的生命周期中的“弱-强-弱”阶段和状态，形如函数  $y=\cos x$  从  $-\pi$  到  $\pi$  的曲线。在人的低幼年龄段是“弱”的，在青年和中年阶段是“强”的，在老龄阶段是“弱”的。社会保障是对人的“弱”的阶段和状态的应对，恰如微积分中的分析：

由定积分的几何意义，如果函数  $y=\cos x$  在  $[-\pi, \pi]$  上连续，则由曲线  $y=\cos x$ ，直线  $x=-\pi, x=\pi$  及  $x$  轴所围成的曲边梯形的面积  $S$  为：

$$S = \int_{-\pi}^{\pi} f(x)dx \quad (3)$$

当  $f(x) \geq 0$  时：

$$S = \int_{-\pi}^{\pi} f(x)dx \quad (4)$$

当  $f(x) \leq 0$  时：

$$S = - \int_{-\pi}^{\pi} f(x)dx \quad (5)$$

对于函数  $y=\cos x$  在  $[-\pi, \pi]$  上有时取正值、有时取负值的情形，其面积  $S=S_1+S_2+S_3$ ，则有：

$$S = S_1 + S_2 + S_3 = - \int_{-\pi}^{-\frac{\pi}{2}} f(x)dx + \int_{-\frac{\pi}{2}}^{\frac{\pi}{2}} f(x)dx - \int_{\frac{\pi}{2}}^{\pi} f(x)dx \quad (6)$$

从对微积分的理解，我们回到社会保障对人们的保障，可以看出：第一，在人的低龄阶段，因为“幼弱”，所以其基本生活的获得来自家庭或社会保障，表现为纯“获取”，对应的  $S$  值为“-”。第二，在人的青 / 中年阶段，因为“强”，所以其基本生活的获得来自自身的劳动收入，对应的  $S$  值为“+”；在人的青 / 中年阶段可能的“动态弱”“常态弱”，则以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方式进行保障，表现为占比较小的  $S$  值为“-”的情况。第三，在人的老龄阶段，因为“老弱”，所以其基本生活的获得来自家庭或社会保障，表现为纯“获取”，对应的  $S$  值为“-”。

纵观人的一生，在“弱-强-弱”的阶段和状态，都可以获得对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这就是图 6 中由曲线  $y=\cos x$ 、直线  $x=-\pi$ 、直线  $x=\pi$  及  $x$  轴所围成的曲边梯形的面积  $S$  的经济内容和社会意义。由此可见，不管是静态还是动态地看待“水母型”社会结构中的人（群）的分布、阶段和状态，从社会保障角度看，必须强化青年、中年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因为这关涉他们自身青 / 中年阶段收入和社会保障权益、他们老年时社会保障权益，也关涉他们的子女（新一代劳动者）的基本生活保障。

## 五、强化基于就业的社会保障——对青年、中年年龄段的分析

下面我们以罗纳德·科斯的理论观点为依据，区分出：有明确边界的企业中的就业以及灵活就业；有明确边界的企业中的就业以及更大更复杂的平台就业。进而分析其中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情况。

### （一）工业化社会中的就业和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制度就其实质而言，既是有劳动能力的人为还不能劳动的儿童和已经不能劳动的老人、病人、残疾人而劳动，也是代际之间的抚养和赡养以及同代之间的同舟共济。用于社会保障事业的全部资金归根到底都是来源于创造财富的劳动。因此，社会保障制度必须依赖于就业，致力于促进就业。马克思认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sup>①</sup>其实，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如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sup>②</sup>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由其推动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在的劳动，立足自然空间即土地的工农业劳动只占一部分，大量的服务业特别是基于互联网的新兴产业及平台就业，虽然不能否定“土地是财富之母”，但其对自然空间的需要已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了。当然，“劳动是财富之父”依然是经济社会中的基本准则。

历史进程也正是如此。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起源于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针对劳动者建立的三项社会保险。其中，先颁布实施的两项立法即《疾病保险法》（1883年）和《工伤事故保险法》（1884年），就是为了解决虽然处于劳动年龄段却因疾病、工伤而不能劳动的人“动态弱”“常态弱”的问题，旨在促进他们治愈、康复，重返劳动以创造财富。后来才颁布实施《养老保险法》（1889年），以着手解决超出劳动年龄段的劳动者的“老弱”问题。

在人的生命周期中，青/中年阶段是劳动年龄阶段，在此阶段的劳动者，通过劳动创造使用价值，通过价值交换获得工资和财富，解决自己及家人的生活，从古至今，历来如此。但是，在此阶段，人们或者因为身体健康原因，或者因为经济社会原因，无法劳动，也就没有收入，自己及家人生活都可能陷入困境。家庭家族保障机制、社会互助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险机制都难以长期有效地保障劳动者及其家人，因此，国家必须建立超越于家庭的社会保障制度。1601年英国的济贫法解决的贫困问题，相当一部分就是劳动者不能劳动而造成的自身及家庭贫困；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三部社会保险法，确保劳动者在生病、工伤、老年等问题出现时有一定的收入，通过保障劳动者来保障劳动者的家人。

1948年，英国宣布建成了“福利国家”，政府对国民承担起“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保障。按照“福利国家的蓝本”——《贝弗里奇报告》（即《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中所说：就社会保障而言，所有的人群可以被划分为六大类，其中四类在工作年龄以内，一类在工作年龄以下，还有一类在工作年龄以上。在工作年龄以内的四类是雇员、其他从事有酬工作的人员、家庭主妇、其他在工作年龄段内却没有从事有酬工作的人员；在工作年龄以下的一类是尚未达到工作年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6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7页。

的未成年人；在工作年龄以上的一类是超出工作年龄的退休人员。<sup>①</sup> 对前四类人员，建立了基于就业的社会保障，同时也很好地建起了劳动力“非商品化”的社会保障机制。

与福利国家不同，在强制储蓄型社会保障模式的国家，青 / 中年劳动者必须在劳动过程中为自己的养老、医疗等进行储蓄；在国家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的国家，青 / 中年劳动者由政府对在国营经济部门工作的劳动者及其家人实施保障；在东亚福利体制的国家，则强调劳动者通过就业获得收入，从而保障自己及家人。<sup>②</sup> 与福利国家相比，这几类国家都坚持“社会政策不应损害劳动力市场机制成为传统的社会准则”，<sup>③</sup> 重视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因而更能带来经济效率，政府所承担的福利负担也比较小。总之，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福利保障模式，政府都是运用“大数法则”，统御社会理性，通过法律和社会政策让更多的甚至是全体的国民加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长期照护等社会保险制度中，通过收缴社会保险税 / 费，实现对国民的多种保障；同时，通过一般税收筹集的财政资金，对困难人（群）实施社会救助以及其他的福利保障。

## （二）平台化社会中的就业和社会保障

罗纳德·科斯在 1937 年发表的著名论文中指出：直至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同于在公开市场中进行此项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企业中组织此交易的成本为止，企业将一直扩大规模。<sup>④</sup> 科斯从交易成本视角界定了企业规模也就是企业的边界，传统社会保障主要是针对与企业组织有法定劳动关系的就业者，事实上，如图 7 所示，在生产、流通企业之外，大量为企业和消费者从事运输、安装、售后服务的灵活就业人员，他们的社会保障权益受保护情况是不理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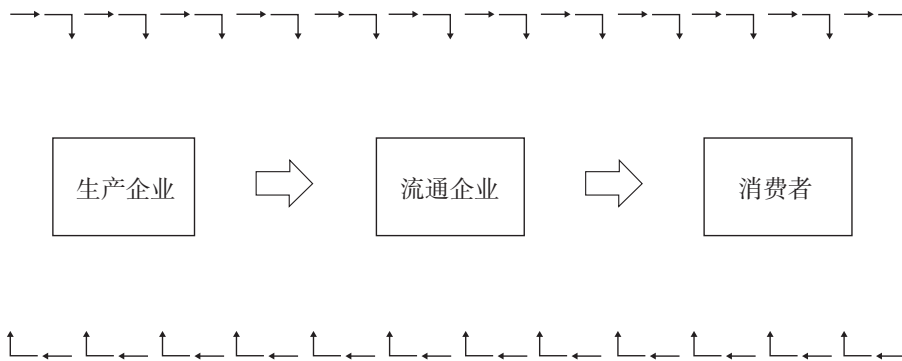


图 7 企业就业和灵活就业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注：企业中劳动者以法定劳动关系为主；箭头所代表的是灵活就业者。

世界银行《2019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开篇即指出：人类的创新才能将引领人类走向何方，人类从来都畏惧这个问题。<sup>⑤</sup> 马克思担忧“机器不仅仅是工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① 威廉·贝弗里奇著，社会保险研究所译：《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 年，第 6 页。

② 林闽钢、吴小芳：《代际分化视角下的东亚福利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0 年第 5 期。

③ 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著，郑秉文译：《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 年，第 165 页。

④ Ronald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1937, 4(6).

⑤ 世界银行：《2019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世界银行官网：<https://www.shihang.org/zh/publication/wdr2019>，2018 年 10 月 18 日。

而且总是置工人于失业的边缘。机器是镇压工人罢工最强大的武器”。<sup>①</sup>凯恩斯早在1930年就发出了技术进步将造成普遍失业的警告。从较长时期看，资本有机构成是不断提高的，而新投资往往采用新技术，因此投资的增加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就业量的相对减少。<sup>②</sup>

在工农业生产领域，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的发展，对劳动者就业已经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基于互联网产生了大量的全职劳动、合同劳动、临时劳工、劳务派遣等新型劳动组织形式，产生了“网约工作”“平台劳动”和“数字零工”等新职业，以及与之匹配的“非雇佣”或“泛雇佣”的劳资关系。<sup>③</sup>

在互联网条件下，人们基于分工的交换更加多样化，涂尔干指出：“任何个人都不能自给自足，他们需要的一切都来自于社会，他也必须为社会而劳动”。<sup>④</sup>马克思也指出：社会越是分化，则个体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越大。买者付出一定量的货币，卖者付出与货币不同的物品。在这里，法的意识至多只认识物质的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法律上对等的公式中：“我给，为了你给；我给，为了你做；我做，为了你给；我做，为了你做”。<sup>⑤</sup>在不同历史时代和社会条件下，市场经济会有不同的特点，但上述基本关系则是共同的，劳动者通过制造商品或提供服务融入“做-给”公式，寻求个人的利益和发展。西美尔则把交换（而不是生产）当作所有社会生活的基础。“货币的功能乃是——与远距和接近的关系一致——把以其他方式所不能达到的东西向我们拉近了。货币在超越空间障碍上的能力更是无出其右。货币使超越空间界限的沟通成为可能，甚至会鼓励这种沟通，因为在近处发现交易伙伴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于在远处”。<sup>⑥</sup>

在互联网广泛应用之前，人们为了销售、购买商品和服务还是要花些时间的，甚至花时间也不易实现目的。基于互联网的平台经济，让商品和服务的供求双方触手可及，让生产企业、流通企业针对消费者的销售、运输、安装、维修等等都超越传统企业的边界，在更大的互联网平台完成销售和服务的信息对接，让实体的企业、组织或个人生产的工农业产品和作品更容易被销售和消费，让更多的人加入了生产、销售、运输和安装等劳动。图8中圈状比较形象地表示了平台公司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可及性、便利性，也显示了企业就业者、平台就业者更容易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做-给”公式的情况。

平台就业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可以将原来的具有劳动关系的就业、灵活就业最大程度地吸纳进平台，平台在为“做-给”公式双方提供信息、结算等服务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管理职能，但是，平台就业的复杂性还是大为提升了。目前，学界对平台就业存在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强调非正规用工制度，认为平台就业代表资本主义早期包买制的历史性回归；第二种看法强调数字劳动过程，认为平台就业体现了数字经济时代的精细分工与去技能化，代表了一种福特制、泰勒主义或新福特制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延续；第三种看法强调弹性生产，认为平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76-477页。

② 约翰·凯恩斯著，徐毓柵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7页。

③ 孙伟平、尹帮文：《论数字劳动及其与劳动者的双向建构》，《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6期。

④ 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85页。

⑤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91页。

⑥ 盖奥尔格·西美尔著，林荣远译：《社会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48页。

台就业的无保障特征是生产弹性化的结果，因而具有后福特制下工作的特点。<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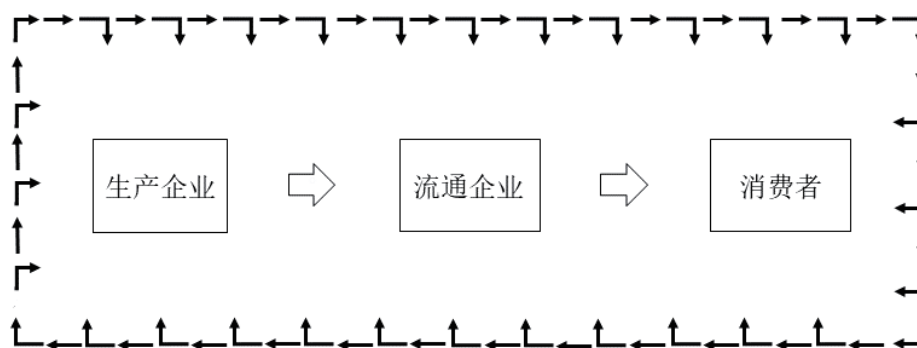


图8 企业就业与平台就业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注：企业中劳动者以法定劳动关系为主；箭头所代表的是平台就业者。

针对平台就业者的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问题，2021年7月，人社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劳动者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双方应当订立劳动合同；二是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双方应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三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的，按照民法调整双方权利义务。<sup>②</sup>

第一种、第三种相对比较容易办理；第二种在不完全劳动关系下，针对快递员、外卖员等经常在运输途中的劳动者，可以开展工伤保险等项目，强制性规定平台企业和就业者必须参加。20世纪90年代，针对制造业工厂中凸显的工伤问题，东莞市政府率先在企业中推进工伤保险全覆盖，起到了很好的效果。<sup>③</sup>在强制性养老和医疗社会保险方面，也可以视情况进行改革，如养老方面，劳动者可以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或者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选择，当前，需要适当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以及相应提高缴费标准。而医疗方面，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大病补充保险，应能满足广大平台就业人员的基本医疗需求。

### （三）青 / 中年劳动者社会保障的微积分分析

从上述对当前劳动就业的复杂情况的分析，可见既然全部社会保障资金都来源于处于青 / 中年年龄段劳动者的积累，那么就业就不仅是“民生之本”，也是“社保之本”。社会保障的本质，从微分的角度看，就是基于劳动者（在广义上使用，包括工薪阶层、自由职业者和其他缴纳社保费的社会成员）每天的收入计算、征缴社会保障税 / 费（按照周、月或年缴纳）；从积分的角度看，就是对“幼弱”“老弱”和“常态弱”“动态弱”者们予以基本生活费的提供（按照周或月发放）。处于劳动年龄段的劳动者一方面有为“还不能劳动的儿童”和“已经不能劳动的老人”提供社会保障资金的义务，包括为自己将来不可避免地老去积累社会保障资金；另一方面他们自身也会陷入“动态弱”甚至“常态弱”的境遇，从而也享有医疗、失业、工伤等社

① 齐昊、田勋：《平台经济中的“无保障工作”——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4期。

② 封进：《劳动关系变化、劳动者需求与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社会保障评论》2022年第5期。

③ 严新明、童星：《基于时间向度的劳动风险防范——以东莞工伤社会保险实践为例》，《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

会保险待遇和残补型救济（如低保、残疾人福利等）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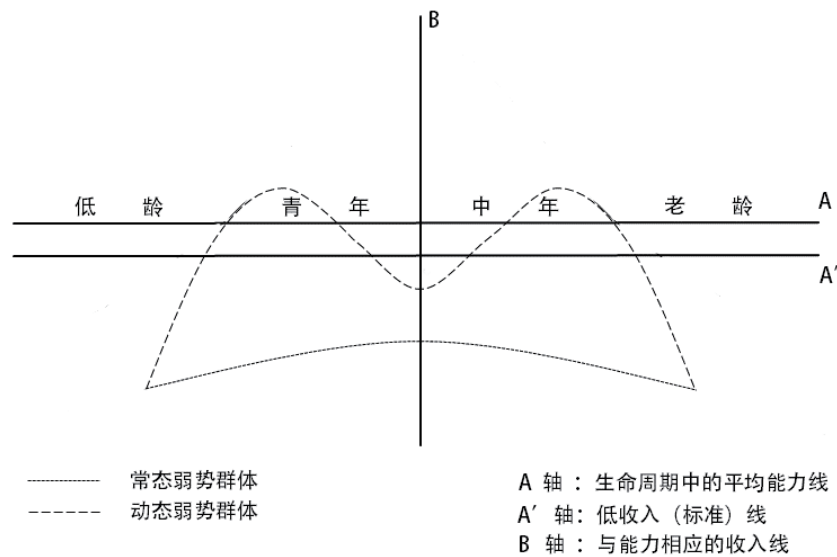


图9 青/中年“动态弱”“常态弱”的人群享受社会保障情况

图6中的  $S_2$  即为处于劳动年龄段的劳动者应尽的社会保障义务，图9中A轴和A'轴之间的部分则为他们应享有的权利。从式(6)中可得：

$$S_2 = \int_{-\frac{\pi}{2}}^{\frac{\pi}{2}} f(x)dx \tag{7}$$

该部分社会保障项目对应的微分化精算、积分化征缴税/费和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情况如下(见表1)：

表1 部分社会保障项目微分和积分分析

风险类型	微积分化征缴税/费	缴税/费主体	微积分化享受社保待遇	社会保障责任原则
老年	养老金缴税/费	企业、职工	预期性、确定性的养老金	基于劳动者创造价值的部分积累
工伤	工伤保险税/费	企业	即时性、可能性的工伤待遇	同上
疾病	医疗保险税/费	企业、职工	及时性、可能性的医疗待遇	同上
失业	失业保险税/费	企业、职工	及时性、可能性的失业待遇	同上
生育	生育保险税/费	企业	及时性、可能性的生育待遇	同上
贫困	一般纳税		及时性、必要性的社会救助金	公民的社会救助权

注：即时性，指工伤社会保险以“职工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在时间方面是同步的；及时性，指职工出现疾病、失业等情况能及时得到相关社保待遇及服务，在时间方面是很近的后续特点。

在采取社会保险形式应对的社会保障项目中，通常都需要做精算。工伤、疾病、失业、生育保险都具有即时性或及时性，领取或享受这些保险项目的待遇，又都具有可能性，因而其本

质上是基于“大数法则”的参保者之间的社会互济，往往只需要在年度内力求收支平衡，必要时辅以动用财政准备金。而具有预期性和确定性的社会养老保险，离不开微分化精算、税/费征缴和积分化待遇享受，其间特别要关注缴费比率和替代率两个指标。

1. 缴费比率。与商业养老保险的自愿投保不同，社会养老保险通常规定在职职工必须按其工资的某个比例缴纳保险费，这个比例即被称为缴费比率，用  $J$  来表示。<sup>①</sup>

若  $x$  岁职工的工资为  $S(x)$ ，则该职工当年的缴费数量：

$$P(x) = J \cdot S(x) \quad (8)$$

需要注意的是， $J$  可以是恒定的常数，也可以随着其他因素变化， $J$  是常量还是变量必须根据具体的缴费政策来确定。若不同年龄的缴费比例不同，则缴费比率  $J$  将是  $x$  的函数，随着  $x$  的变化而变化。此时，缴费比率应该写成  $J(x)$ 。相应的，该职工当年的缴费数量：

$$P(x) = J(x) \cdot S(x) \quad (9)$$

2. 替代率。养老保险替代率通常定义为在职职工退休后的养老金收入与退休前工资水平的比率，用  $k$  来表示。在一般情况下，在职职工退休后的收入比起在职时有所减少，所以，替代率应该满足  $0 < k < 1$ 。可用公式来表示：

$$k = \frac{R}{S} \quad (10)$$

其中  $R$  可以代表个体参保人退休当年的养老金或者一个地区当年退休的所有参保人的养老金水平。相对应的， $S$  可以代表个体参保人退休前一年的工资或前几年的平均工资水平，也可以代表一个地区当年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合适的替代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养老保险制度成败的关键，它必须在保障退休人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维系整个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持续运行之间取得某种平衡。

英国学者研究指出：多达三分之二的社会福利是自筹资金，体现了“储蓄银行（savings bank）”效应。<sup>②</sup> 我国的社会保障情况要复杂一点，因为实施了近半个世纪的劳动保险条例未安排劳动者缴费和积累，1995年养老改革中的“视同缴费”政策，以及2017年国务院确定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储蓄”效应。<sup>③</sup> “储蓄”效应说明福利国家以及社会保险型国家的养老社会保障项目的精算工作做得好与否，体现在微分化征税/费与积分化领取社会保障待遇二者之间能否很好地对应起来。

## 六、确保“老弱”的社会保障——缴税/费而来的权益或公民的社会权

在人类的生命周期中，老年和幼年是两个特殊且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一方面，人们的自理自立能力不足，亦无法通过劳动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从而需要在物质和服务等方面获得来自家庭或社会的支持；另一方面，幼儿阶段是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决定

① 宋世斌、申曙光：《社会保险精算》，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第53-55页。

② 尼古拉斯·巴尔著，郑秉文等译：《福利国家经济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第238页。

③ 严新明、童星：《“空账”不空——对国有资本与社保基金关系的社会时空研究》，《社会保障评论》2020年第2期。

着未来的国民素质，老年人虽然不直接参与当下的经济生产，却依然拥有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从而都需要得到保护与支持。<sup>①</sup>

古代圣贤孟子的理想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sup>②</sup>从社会保障的理论视角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以下几个层面的含义。

首先，“老吾老”，就是尊重自家的老人。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老的传统，古代有通过“举孝廉”考察和选拔人才的做法。现在一方面弘扬敬老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通过立法保护老年人的权益，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家庭成员应当尊重、关心和照料老年人。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

其次，“以及人之老”，就是也尊重别的老人。这层意思体现了人类由蛮荒走入文明之后，基于恻隐之心的人类情怀。《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规定：发扬邻里互助的传统，提倡邻里间关心、帮助有困难的老年人；鼓励慈善组织、志愿者为老年人服务；倡导老年人互助服务。

再次，“老吾老”，就是为自身的老年进行健康准备、养老金储备。政府已经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健康老龄化”，不过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具体表现为个体在青/中年时期就要注意自身的健康，到老年时才能拥有健康的身体；个体在青/中年时期依据法律政策缴纳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费，到老年时才能获得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待遇。个体到老年时既有健康的身体，又享有因自己缴费而获得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待遇，高质量的老年生活就有了保障。

放眼世界，虽然各国国情不一样，但绝大多数国家都已超越了完全依靠家庭承担养老责任的年代，建起了符合各自国情的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国家型社会保障模式，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的国家，都建立了针对全体老年人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如贝弗里奇报告中所提及的“第六类人”，即“超出工作年龄的退休人员将可以领取退休养老金”。<sup>③</sup>社会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国家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和强制储蓄型社会保障模式，以及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和东亚福利体制的国家，则主要建立了基于就业和缴费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对没有缴费参保的老人则提供基本养老金和基本医疗服务（这种情况更多地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处于劳动年龄段的青/中年劳动者为整个社会的老年人养老给予代际互助，即提供式（6）中的：

$$S_3 = - \int_{\frac{\pi}{2}}^{\pi} f(x) dx \quad (11)$$

世界银行的研究认为：积极看待老龄化现象，为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将有助于政府应对

① 郑功成等：《从饥寒交迫走向美好生活——中国民生70年（1949—2019）》，湖南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406页。

② 孟子：《梁惠王上》，转引自陈成国点校：《四书五经（上）》，岳麓书社，2014年，第66页。

③ 威廉·贝弗里奇著，社会保险研究所译：《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年，第6页。

民众需求,同时还有助于塑造未来服务行业和服务市场的发展,使之成为国内消费的主要来源。<sup>①</sup>

针对老年人的这些社会保障项目(养老、医疗、长期照护等),其对应的微分化缴税/费、积分化领取及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情况如下(见表2):

表2 关于“老弱”的社会保障项目微分和积分分析

风险类型	微积分化征缴税/费	缴税/费主体	微积分化享受社保待遇	社会保障责任原则
参保者的老年	养老保险缴税/费	企业、职工	社会保险养老金	基于劳动者创造价值的一部分积累
未参保者的老年	一般纳税		基本养老金	公民的社会权利
疾病	医保缴税/费或一般纳税	注	可能的治疗费、照护费	同上

注:以我国为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者缴费达到规定的年限,老人直接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家庭为缴费单位,包含为老人的缴费,困难老人由政府补助。

## 七、确保“幼弱”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未来公民的健康成长

从社会保障的理论视角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上述孟子所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以下几个层面的含义。

首先,“幼吾幼”,就是爱护、抚养自家的小孩(们)。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爱幼护犊的传统,现行的法律政策对儿童权益的保护力度也是很大的。

其次,“以及人之幼”,就是也关心、爱护别人的小孩(们)。从传统文化到现行法律政策,都提倡关心爱护孩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开展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活动和服务。

再次,“幼吾幼”,还含有对自身幼时成长过程的体验,从而加深对父母及长辈的情感。由于人对自身幼年时的最初三、五年成长情况是没有记忆的,因此,不能再次亲自体验自己幼时的情形,但是,“养儿方知父母恩”,所以,每个人在身为子/女的时候、身为父/母的时候,在多重角色压身的时候,其对代际之间的抚养、赡养责任的理解就会加深,这一点不仅限于在家庭内部,在社会的代际之间也是一样的,如“儿童友好城市”<sup>②</sup>建设就体现了这种理念。

尽管从历史上看,儿童的需要往往被包含在家庭的需要之中,但在当代,儿童和家庭在福利政策中的地位逐渐在转变。鲁斯·利斯特(Ruth Lister)认为,“我们正在见证一个真实且空前的转变,地方和国家转向提高对儿童投资的社会优先级别”。这标志着随着国家朝“社会投资型国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的方向发展,儿童和家庭在福利组合中的地位发生了意义深远的转变。“社会投资型国家”是从传统福利政策国家转向建立对社会和人力资本进行投

① 葛蔼灵、冯占联:《中国养老服务的政策选择:建设高效可持续的中国养老服务体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9年,第56页。

②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等:《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社会〔2021〕1380号),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0/21/content\\_5643976.htm](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0/21/content_5643976.htm),2021年9月30日。

资的国家。在这个福利战略中，儿童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功的关键，他们是“未来的主人公/未来的公民角色”。<sup>①</sup>

在具体政策上，福利国家型社会保障模式，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和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国家，都建立了针对全体儿童的社会保障或福利，如贝弗里奇报告中的“第五类人”，即“尚未达到工作年龄的人员将可以享受子女补贴，该补贴由国家财政支付，覆盖所有父母领取社会保险待遇或养老金的儿童”。<sup>②</sup> 社会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国家如法国，在20世纪70年代推行的家庭保障，对儿童进行特别保障；<sup>③</sup> 强制储蓄型社会保障模式国家如新加坡，从2001年开始实施“婴儿花红计划”，帮助家庭支付抚养子女的成本。<sup>④</sup> 即式(6)中的：

$$S_1 = - \int_{-\pi}^{\frac{\pi}{2}} f(x) dx \quad (12)$$

该部分社会保障项目对应的微分化缴税/费、积分化领取社会保障待遇的情况如下(见表3)：

表3 关于“幼弱”的社会保障项目微分和积分分析

风险类型	微积分化征缴税/费	缴税/费主体	微积分化享受社保待遇	社会保障责任原则
儿童基本生活需求	一般纳税		儿童津贴	公民的社会权利、社会投资
公共卫生、疾病	同上		公共卫生费、可能的治疗费	同上

## 八、结论

在工作性质有了很大改变、就业形态多样化特点日益明显的形势下，为应对工业化劳动中的风险而设立的社会保障，确实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因为社会保障必须对人的脆弱性有所回应，包括：动态地看每个人必然存在的“幼弱”“老弱”、可能存在的“动态弱”“常态弱”；静态地看客观存在的“幼弱”“老弱”“动态弱”“常态弱”群体。政府可以超越个体(家庭)，对人的生命周期中的个人(家庭)基本生活需要进行安排，从而统御个体理性、消除个体理性造成的社会非理性结果，实现社会理性。贝弗里奇于1942年撰写的《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报告将社会政策看作是一种反生命周期方法(counter-life-cyclical device)。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观点与凯恩斯的经济反周期政策(economic counter-cyclical policy)并行不悖。既如此，贝弗里奇就可以强调说他的报告的内容并不是试图劫富济贫，而是想办法使一般人的收入从相对富足期到匮乏期变得均匀一些。<sup>⑤</sup> 如前文所述，包括对小孩的生活费用的安排，以及老人养老金的安排，还有常态

① 皮特·阿尔科克等主编，彭华民译：《解析社会政策(下)》，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21页。

② 威廉·贝弗里奇著，社会保险研究所译：《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③ 白澎等：《法国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4页。

④ 贾玉娇等：《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7年，第126页。

⑤ 霍华德·格伦内斯特著，苗正民译：《英国社会政策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1-62页。

动态弱者的社会保障安排，都是青 / 中年人在劳动阶段缴纳社会保障税 / 费，以及缴纳一般税带来的结果。因此，“我们把社会政策看作是生命周期过程中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方式”。<sup>①</sup>

2001年5月，艾斯平-安德森在为其著作《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的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未来几十年中国政策的一个未决因素是家庭团结能否有效地补充可预计的最低社会福利保障。唯一的最大风险也许是，最需要救助的人很可能是那些最没有能力依靠足够的家庭支持的人。<sup>②</sup>

进入21世纪，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体现在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和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sup>③</sup>当前，在全国脱贫攻坚事业取得全面胜利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了迈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sup>④</sup>随着共同富裕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幼弱”“老弱”和“常态弱”“动态弱”者们必将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社会保护和发展帮扶。可以肯定，政府在“幼弱”“老弱”的社会保障方面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在青 / 中年“常态弱”“动态弱”者们的劳动力“非商品化”方面应该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即式(6)中的 $S=S_1+S_2+S_3$ 都具有经济社会意义。也就是说：在“水母型”社会结构中，儿童和老人以及遇到困难的青 / 中年人，都能有一份提升到A'轴之上的基本生活保障，这对个人及其家庭，甚至全社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保障。

## A Study of Social Security Principles Based on Human Vulnerability

Yan Xinming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oretical research has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advancing the establishment and adjustment of the modern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umulative impact of vulnerability throughout the human life cycle, considering physi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Utilizing the framework of a "jellyfish-type" social structure, the paper delineates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etal groups—namely, the

① 霍华德·格伦内斯特著，苗正民译：《英国社会政策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3页。

② 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著，郑秉文译：《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5页。

③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1-02/25/content\\_5588869.htm](http://www.gov.cn/xinwen/2021-02/25/content_5588869.htm)，2021年2月25日。

④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minor, young, middle-aged, and old—and highlights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minor and older groups. The life course trajectory, characterized by "weak-strong-weak" transitions, is dynamically traced. 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unfolds, traditional support systems such as family, mutual aid, and market mechanisms become insufficient to safeguard all members of society, necessit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social security mechanism. Introducing a social security calculus model based on the Newton-Leibniz formula, the paper delves in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social security. It advocates strengthening employment-based social security for young and middle-aged individuals, particularly the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latform workers in complex situations. Additionally, it proposes ensuring social security for the "old vulnerable" through mechanisms rooted in taxes/contributions or civil rights and providing security (welfare) for the "young vulnerable" to foste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future generations. Recognizing social security as a form of income redistribution over the life cycle, governments must scientifically and rationally design policies address the basic needs of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Key words:** life cycle; human vulnerability; "jellyfish-type"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security calculus model; platform employment

(责任编辑: 郑碧亭、郭 林)

